

# 郑永年： 中国那么乱的时候 他已判断中国会崛起

中国政府上个月追授我国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“中国改革友谊奖章”，并称他为“推动新加坡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家”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，这个表彰对李光耀是实至名归。

郑永年上周接受《联合早报》采访时指出，中国在1980年代启动推行改革开放，本来就和新加坡有直接关系。1978年11月5日到14日，邓小平依次访问了泰国、马来西亚和新加坡。在他出访途中，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工作会议于11月10日召开。11月13日上午，邓小平参观了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，又在建屋发展局听取关于新加坡公共住房计划。

郑永年说：“（此次出访）本来是要来解决越南问题，但回国后邓小平就讲改革。”那一年12月18日，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，标志着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毛泽东时代结束，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邓小平时代的开始。

郑永年指出，中国大陆当年向很多国家和地区学习，其中亚洲四小龙（台韩港新）、日本都属于儒家文化圈，对邓小平影响最大。邓小平在1978年访日，参观了日产、松下等知名公司，并邀请松下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忙，获后者应允。松下幸之助也是这次获“改革友谊奖章”的

10名外国人士之一，被称为“国际知名企业参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”。

李光耀在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，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。郑永年分析，李光耀跟晚年的毛泽东会面不算愉快，李光耀当时已经看到日本、四小龙等儒家文化圈在崛起，他因此相信中国经济落后，不是华人文化的原因，而是体制造成的。郑永年说：“他最令人佩服之处，就是当中国那么乱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判断中国会崛起。”

## 不排斥与共产党人交往

史料记载着，李光耀1978年告诉邓小平，新加坡华人多数是从中国广东、福建南下的家无寸土、目不识丁的苦力后代，反之中国拥有留守中原的达官贵人、文人学士、状元的后代，“因此，凡是新加坡能够做到的，中国也一样能够做到，而且会做得更好”。

郑永年强调，李光耀的过人之处，在于他并非如一般政治人物那样嘴上说说而已，而是根据中国大陆将崛起的判断，调整新加坡的政策。“新加坡和台湾当初关系很紧密，为何不写繁体字而采用简体字呢？他是真相信中国大陆会崛起，而不是像一般人说着好话，捧杀中国。”

而面对共产党统治的中国，早年持坚定反共立场的李光耀，依然能够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深入交往，郑永年分析，这是因为李光耀将共产党作为意识形态和体制，以及共产党人本身分开看待。

他告诉邓小平，不要在东南亚输出意识形态，但他也实事求是跟共产党人交往。“他为何最佩服邓小平？因为邓小平也是现实主义者。”

郑永年指，邓小平说过，共产党人搞革命，就是要让老百姓的生活好起来，就像新加坡

那样，所以共产党本身也要改革。“当邓小平这一代人上台后，共产党人就跟他所要实现的制度一致了，所以李光耀后来跟他们的交往就没有问题。”

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西方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，李光耀又扮演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沟通者角色。

郑永年说：“因为中国不知道如何表述自己，也没有自信心，西方那时也太强势了。当中国遇到困难，西方围堵中国的时候，他说得很明白：你们的围堵确实会影响中国，会拖慢中国崛起的速度，但阻挡不了中国崛起。他这个判断非常正确，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。”

## 李光耀预言被验证

10年前，中国曾有舆论痛批李光耀要求美国“平衡”中国，郑永年解释，李光耀是根据现实主义的判断谈“再平衡”（rebalancing），并非应当不应当的问题，而是这些国家会怎么做，今天他的“预言”也再次被验证了。作为现实主义者，李光耀与基辛格等现实主义者有共同的语言，跟一般的理想主义者没有共同语言。

郑永年强调，新加坡是中国的诤友，可以有话直说。“因为新加坡小，对中国没有什么威胁。有哪位中国领导人说过李光耀的坏话吗？一个都没有。”

►由《联合早报》推出的中英文版的《李光耀看六四后的中国·香港》，1990年出版后不久即销售一空。（林泽锐摄）



▲郑永年：有哪位中国领导人说过李光耀的坏话吗？一个都没有。（档案照片）



▲李光耀在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，跟晚年的毛泽东（左）会面，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。（档案照片）